

启功 著

古代字體論稿

陳垣題



文物出版社

啟功著

古代字體論稿

陳垣題



封面题字：陈 垣

封面设计：周小玮

责任编辑：苏士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代字体论稿/启功著. -2版. -北京：文物出版社，
1999.3

ISBN 7-5010-1119-2

I.古… II.启… III.汉字-字体-研究-古代 IV.H1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1903 号

古代字体论稿

启功 著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五四大街 29 号

<http://www.wenwu.com>

E-mail:web@wenwu.com

北京市美通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 × 1092 1/16 开 印张：8

1999 年 3 月第二版 1999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0-1119-2/G · 86 定价：20.00 元

目 录

一 问题的提出	(1)
二 考察的起点	(3)
三 八体、小篆	(7)
四 籀文、大篆	(10)
五 古文	(14)
六 科斗书	(17)
七 鸟虫书、虫书	(20)
八 隶书、左书、史书	(23)
九 八分	(28)
十 草书、章草	(32)
十一 余论	(34)
后记	(39)
图版	(43)

古代字体论稿图版目次

1	商甲骨卜辞	23	楚王畚盂盘
2	骨匕刻辞（甲）	24	长沙仰天湖楚简
3	骨匕刻辞（乙）	25	信阳楚简
4	戍嗣子鼎	26	秦石鼓文
5	帝辛四祀卣	27	秦公敦
6	帝辛四祀卣象形文字款识	28	大良造鞅量
7	象形文字款识	29	大良造鞅铎
8	墨书陶片	30	吕不韦戟（一）
9	砾书玉片	31	吕不韦戟（二）
10	墨书兽骨	32	阳陵虎符
11	周矢令殷	33	泰山刻石
12	史颂殷	34	诏版（甲）
13	小克鼎	35	诏版（乙）
14	宗妇殷	36	瓦量
15	曾伯猗壶	37	汉太初简
16	曾伯猗壶盖	38	神爵四年简
17	齐陈曼簠	39	五凤元年十月简
18	智君子鉴	40	五凤元年十二月简
19	麤氏钟	41	阳朔四年简
20	曾姬无卣壶	42	阳泉使者舍熏炉
21	楚王畚璋戈	43	汉铜鼎
22	楚王畚肯盘	44	新莽嘉量

- | | | | |
|----|----------|----|-------------|
| 45 | 天凤元年简 | 72 | 刘宋爨龙颜碑 |
| 46 | 始建国二年简 | 73 | 北魏嵩高灵庙碑额 |
| 47 | 殄灭简 | 74 | 嵩高灵庙碑 |
| 48 | 春君、苏且简 | 75 | 吊比干碑 |
| 49 | 郗君开通褒斜道记 | 76 | 鞠彦云墓志 |
| 50 | 武威铭旌 | 77 | 梁贝义渊书始兴王碑额 |
| 51 | 永寿二年瓦罐 | 78 | 东魏高盛碑额 |
| 52 | 缙伋妾娟 | 79 | 高盛碑 |
| 53 | 熹平瓦罐（一） | 80 | 西魏杜照贤造像记 |
| 54 | 熹平瓦罐（二） | 81 | 北齐韩宝晖墓志 |
| 55 | 熹平石经 | 82 | 唐邕写经记 |
| 56 | 郭香察书华山碑 | 83 | 文殊般若经碑 |
| 57 | 尹宙碑 | 84 | 北周赵文渊书华岳庙碑 |
| 58 | 曹魏上尊号碑 | 85 | 隋赵超越书舍利函铭 |
| 59 | 受禅表 | 86 | 暴永墓志 |
| 60 | 孔羨碑 | 87 | 唐太宗书晋祠铭 |
| 61 | 钟繇书宣示表 | 88 | 欧阳询书房彦谦碑 |
| 62 | 钟繇书贺捷表 | 89 | 欧阳询书九成宫醴泉铭 |
| 63 | 钟繇书荐季直表 | 90 | 武则天书升仙太子碑 |
| 64 | 正始石经 | 91 | 唐人写隶古定尚书大禹谟 |
| 65 | 景元四年简 | 92 | 唐人写说文解字木部 |
| 66 | 咸熙二年简 | 93 | 日本古写本说文解字口部 |
| 67 | 吴谷朗碑 | 94 | 宋版说文解字 |
| 68 | 谷朗碑额 | 95 | 清藤花榭本说文解字 |
| 69 | 皇象本急就篇 | | 附图 1 战国中山刻石 |
| 70 | 晋王羲之书十七帖 | | 附图 2 秦律简 |
| 71 | 爨宝子碑 | | |

一 问题的提出

中国汉字的发展，自商代到今天，足有四千多年的历史。它标志着中国历史文化的悠久绵长，从来未曾中断。它的形状变化，异常复杂多样，尤其文献所载的字体名称和实物中所见到的字体形状，又往往对不上头。于是给后代对于古代文字的辨识，对于古代文字发展的探索，以及对于某些古文物或古书真伪的判断等等方面，都留下许多问题。

所谓字体，即是指文字的形状，它包含两个方面：其一是指文字的组织构造以至它所属的大类型、总风格。例如说某字是象什么形、指什么事，某字是什么形什么声；或看它是属于“篆”、“隶”、“草”、“真”、“行”的哪一种。其二是指某一书家、某一流派的艺术风格。例如说“欧体”、“颜体”等。我们知道一个书家或流派的艺术风格，多是指它们在一种大类型中的小分别。因为欧阳询与颜真卿的分别，不是说欧写篆书、颜写隶书，而是对他们在共同写真书的条件下比较而言的。同时还值得注意的是，古代有些字体风格，从甲一大类型变到乙一大类型时，也常是从一些细微风格变起的。例如篆和隶现在看来是两种大类型，但在秦代，从篆初变隶时的形状，只是艺术风格比较潦草一些、方硬一些而已。这足见字体的演变常是由细微而至显著的。

如果再进一步追求，为什么古代字体有那些变化？例如同属于周代的文字，为什么铜器上的和书籍上的不同？随着那些字迹形状变化，各命以不同名称，又是什么理由和根据？又如秦代的“正体字”为什么叫“篆”？汉代的“正体字”为什么叫“隶”或“八分”？这些问题，简单说来，即是名与实的关系和体与用的关系。

我们已知汉字在形体发展历史上各个阶段都有大小不同的纠葛，简单

归纳，可有三项，而其中第一、第二两项，尤其复杂。

第一项：小篆以前的字体名称与实际形状的问题。按小篆的形状是比较明确易见的，在它以前的种种字体的名称与形状，便有歧异。例如《说文解字叙》里所提到的“秦书八体”中，小篆之前，只有“大篆”一种；而《说文解字》书中，小篆之外，却有“古文”、“籀文”，而无大篆，那么大篆与古文、籀文，究竟有什么关系？有的书中把这三种并列，甚至一齐罗列各种花体字，并不分析它们的关系，这是比较省事的办法。又有的书中把商周铜器上的字概称为“古籀”，这是比较笼统的办法。还有的书中只从文字所在的器物种类来定字体的名称，甲骨上的称为“甲骨文”，铜器上的称为“钟鼎文”或“金文”，陶器上的称为“古陶文”，玺印上的称为“古玺文”等等。这固然比较客观，但仍未能从中看到古代字体命名的理由，也就是还不能解释《说文解字》中所提的关于古代字体最早命名的问题。

第二项：隶与八分的异同问题。按隶这一体，既然秦代已有，汉至唐也有。我们知道这种同名的情况，并不仅是后代模仿或沿用前代某种旧字样，而主要是同名异实。那么它们的具体形状分别究竟何在？还有隶和八分究竟谁先谁后？二者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八分一词究竟怎么讲？如此等等，纠缠的时间既很久远，涉及的古代文献和实物也很众多。

第三项：其他许多比较零星的问题。例如《说文》中的古文与魏《正始石经》中的古文，以至《汗简》等书中的古文，为什么都是两头尖或说蝌蚪形的笔划？它们究竟伪不伪？又如“史书”究竟是一种什么字体？“章草”的“章”字怎么讲？如此等等，也都有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的必要。

至于研究探讨的方法，在前代常见的有两种：一是偏于文字的组织构造方面的，这包括对文字的形、音、义的研究；二是偏于书写的艺术风格方面的，这包括对各种书法流派的品评、各种碑帖的考订等等。前者所据，较多侧重古代文献的记载；后者所据，较多侧重某些著名法书字迹。这两方面的研究，固然在其本范围中都有很大的成果，但由于文献中名称

的纠缠既多，而当时地下实物的发现尚少，所以各自受到局限，而常常不易合榫。

自近代考古发掘的发达，出现了大量的古代文字实物资料，这给研究古代字体带来极大的帮助。从商代以下各个时代的、各个用途的实物资料，大致都可以见到。因此得知，字体名称和形状的变化，因素很多，必须从实物和文献互证，才能得出比较可靠的真象。现在试就实物资料和文献资料两方面作一次综合考察，看它们有什么现象。希望从这里探索到古代各种字体的名和实、体和用的关系。

二 考察的起点

甲 从实物资料中看到古代字体的几种现象：

从实物资料方面看古代字迹的风格，发现几种现象：例如商代的甲骨（图 1）、陶片（图 8）、玉片（图 9）上一些手写的字迹，其书写笔法与风格，大致是一类情况；甲骨上刊刻的字迹，大致另是一类情况；牛头、鹿头刻辞和骨匕上的刻辞（图 2、3），又是一类情况；范铸的铜器中一些象形字（图 6、7）是一类情况；一般铭文（图 4、5）又是一类情况；其他玺印等又是另外一类情况。再例如战国的竹简上手写的字（图 24、25）和铜器上范铸的（图 20）或刻划的字（图 23），效果不一样。又如秦代颂功刻石的字（图 33）与诏版上的字（图 34、35）不一样。汉代的简札中，郑重的问候名刺（图 48）与火急的军书（图 47）不一样，碑版和铜器上的款识不一样，和军书更不一样。如此等等，以下不再详举。各代各类的字迹，虽没有全面见到，但手写、刻划、范铸的各种样品，大致略具。只

有西周和秦未见墨迹，战国未见刻石，还有待于地下材料的出现^①。

从以上的资料看来，汉字的形状方面，千差万别。简单说来，在下列条件下，各有不同的字体。即：(1) 时代；(2) 用途，如鼎彝、碑版、书册、信札等；(3) 工具，如笔、刀等；(4) 方法，如笔写、刀刻、范铸等；(5) 写者、刻者；(6) 地区。由于以上等等条件的不同，则字体亦即不同。而同在某一条件下，如加入其他条件时，字体便又不同。例如两器同属鼎彝，是用途条件相同，如果加上其他条件的关系，字体即不相同；同一写者所写两件字迹，加上其他条件的关系，亦便互不相同。其余如此类推，变化非常复杂。

以上所说的字体的不同，又要看构造和风格两个方面：

(一) 组织构造的变化, 其中包括:

(1) 各个组成部分的不同，也可以说各单体或偏旁不同。例如：白、日、𠂇、𠂆，酬、酌等。

(2) 各局部的安排以及笔划数量的不同。例如：𠂇、𠂇，纹、紊，𩇛、雷，𠂇、冰、冰等。

(二) 书写风格的变化, 其中包括:

(1) 笔划转折轨迹的不同,即圆转或方折等差别。例如:秦泰山刻石(图 33)与秦诏版(图 34、35)不同。

(2) 点划姿态的不同, 例如: 一、一, 人、人等。

(3) 表现字迹的条件不同,即用途、工具、方法等等的差别。例如笔写的与刊刻的不同,范铸的字与刻划的字不同,像吕不韦戟中“诏事”二字(图31)与同戟中“诏事”之外的其他各字(图30、31)不同。

(4) 书写习惯的不同，例如时代、地区、写者等等各有其特点，互相不同。

以上各项中间，当然也各有一些相互交叉的地方。尤其是两种大类型

① 重版时著者按：秦代墨迹今已见，见本文第八节；战国刻石今已见，见附图1。

紧接递邈时，也常是先从书写风格变得较多。并且凡一种大类型中也必兼具组织构造和书写风格两项条件的。

字体命名的角度也各有不同。有单由构造或单由风格的，也有兼由他项条件的，还有同属一种字形，由于用途的不同，而得两种以上名称的，情况非常复杂。但总的来说，兼包构造与风格的大类型，可以说有四种：即是篆、隶、草、真。其他如行书是草、真的混合物，各种花体字只是各类字的变态或说装饰体而已。

字体风格变化，手写常是开端，范铸刊刻也先由手写，那些直接刻划的也即是用刀代替笔。因为文字的各个组成部分，包括单体或偏旁，常是由表形、表意到表音的基本符号，这是大家公用、约定俗成的。书写风格却每人必然不同，所以签字会在法律上生效，而风格的变化程度，又常是由细微而至显著的。

乙 从文献资料中得到的启示：

文献方面，对于字体名称，最为纠缠。常见同一种名称而各家记述的内容不同，甚至互相矛盾。现在所见到的文献中，有关字体问题的，从《汉书·艺文志》、《说文解字》、《周礼郑众注》以下，直到王国维先生的《史籀篇疏证》等著作，资料很多，所说的也很复杂。但经过综合比较，并与实物对照，得到许多启示，简单归纳，约有六种情况：

(1) 秦以前没有字体分类，无篆或隶等等的名称。“六书”并不是字体名称。

这里须要说明两点：第一，唐张怀瓘《书断》卷上说：“《吕氏春秋》云：苍颉造大篆。”但是《吕氏春秋·君守篇》原文却是“仓颉造书”。这可能是张氏误记，我们不能据此孤证而轻改流传有绪的《吕氏春秋》原书。所以这一条不足以说明秦始皇“书同文字”之前已有了大篆名称。其次，“六书”不是字体名。《汉志》、《说文叙》、《周礼注》所记六个名称，用辞和排列次序，虽互有小异，但内容为“象形、指事、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六事，则都相同。从其作用看，是文字制作的规律。《汉志》

说是“造字之本”。按古代在没有共同用的字典时，这种“造字之本”也就是一种识字诀窍，把文字的构成因素加以分析。拿了这把钥匙，即可开许多的锁。所以“六书”虽原是文字的成因，但用以教学童的目的，则是为作识字的诀窍，并不是教他们用这方法去造字，更不是六种字体。

(2) 秦代篆是规矩的、标准的“正体”，隶是徒隶用的、不标准的“俗体”。

(3) 汉代以来的字形变化，各有专门名称。例如草书、八分等名，都是汉代才有的。

(4) 同一名称，常有不同的内容。例如隶这一名称，在秦汉和晋以下各有不同的内容。

(5) 同一内容，又常有不同的名称。例如汉碑上的字，或称之为隶，或称之为八分。

(6) 名称的兴起，常后于字体的产生和流行。例如周代的一种字，原来并无专名，到了秦代才追称之为大篆。

以上各条的论证，俱见以下各节。

因此得知，字体的各种专门名称，实自秦代才有的。并且每种名称初起时，常是一般的名称，或说是“浑号”，进一步成为某种形体的专名。《书断》卷上曾用父子的关系比喻字体的发展关系，现在也借为比喻以说明这个问题。

譬如有一某甲，生子某乙，则甲便为父。乙生子某丙，甲便被往上推为祖。丙在甲前为孙，而乙在甲丙之间，在甲前为子，在丙前为父。但若在这一家人世代递传的过程中，也许某一辈的某一人特别出了名，他这一支派的子孙便以他的称呼或浑号作为姓氏。从此这种一时的通称便成了固定的专称了。

具体地从字体上说，即是自秦定篆为标准字体后，于是以篆为中心，对于它所从出的古代字，便加一个尊称的“大”字，称之为大篆。这正像祖父之称为大父、祖母之称为大母。对于次于篆的新体字，给它一个卑称

为隶。在给篆所从出的古代字加了“大”字之后，有时又回过头来再给篆加一“小”字，以资区别或对称。有了新草体之后，才给旧草体加“章”字，又回过头来给新草体加一“今”字，以资区别或对称。汉魏之际有了新兴的隶体，即“新俗体”，如永寿瓦罐（图 51）上的小字、熹平瓦罐（图 53、54）、钟繇的表启（图 61、62、63）、景元木简（图 65）的字等。才把像两汉、曹魏碑版上的那类旧隶体字升格称为八分，而把隶这一名称腾出给新俗体。但仍嫌混淆，于是给它定些新名称为“真”、或“正”、或“楷”、或“今体隶书”。

至于秦汉和晋以下各以隶来称呼当时的俗体字，正如每一辈的人在父亲面前都是儿子。但汉碑中的隶体，出名最大，于是隶这一通称，便常为它所独享了。

本文即从小篆往上推述籀、古，再往下递述隶、草。

三 八体、小篆

把各种字体命以专名，始自秦代，现在先从“秦书八体”的问题谈起。

《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六年统一天下之后，李斯奏定：

“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

又，三十四年李斯奏定：

“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

《说文叙》说：

“其后诸侯异政，不统于王，……分为七国，……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

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是时秦烧经书，涤除旧典，大发吏卒，兴戍役，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趋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自尔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

这里有几个问题：“秦文”是什么？其与六国文不合处何在？怎样罢法和同法？“八体”的分别何在？

按“秦书八体”，今天所见到的秦代实物材料还很不足。始皇以来的秦文，见有戈戟款识、颂功刻石、虎符、权量、诏版、印玺、瓦当等。其中大部分的字，确知是小篆，印玺文字应属“摹印”一类，其余六体，不易实指。此外从文献上知道有《史籀篇》中的大篆，还有《说文叙》中所说“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虫者屈中，苛之字止句”等几个“秦之隶书”。实物中各项字迹之间，无论结构或风格，都有同处和异处。例如始皇五年的吕不韦戟（图 30、31）刻划潦草，构造奇异，与六国一些器物中草率的文字相似，而戟中的“诏事”二字的构造和风格则又接近小篆。新郢虎符作于二十六年之前，也接近小篆。但凡二十六年同文以后的文字构造，则都是小篆，只风格上相互略有差别。如颂功刻石最为庄严郑重，权量诏版多见潦草的现象。所以论“秦文”应从二十六年同文为限，前后划分两截：前截字体原很复杂；六国“不与秦文合”的，只是不与后截通用的“标准体”小篆相合而已。

关于罢和同的方法，我们看到秦人不但消极地不再通行使用那些“不合者”，而且还积极地重编字书如《仓颉篇》等来推行小篆。

今据秦书不全面的实物，再结合文献来作总的考察，“秦书八体”，实有四大方面：一是小篆以前的古体，即大篆；二是同文以后的正体，即小篆；三是新兴的“以趋约易”的俗体，即隶书；四是其他不同用途的字体。

自上观之，秦人对于文字既用法律手段进行同和罢，而秦文在不同用

途上风格又不尽同，例如颂功刻石与权量诏版书写风格不同等等，可知当时曾对于字体的书写风格在用途上各划出它们的范围，不得相混，所以规定字体名称，实是有其客观需要的。换句话说，这也是“同文”手段中的一个环节。

秦代正体，或说“主流”，既是篆书，“篆”又怎么讲？按《说文·竹部》：

“篆，引书也。”

什么又叫“引”？《说文·丨部》：

“丨，上下通也。引而上行读若囟，引而下行读若退。”

可见“引”是划线、划道。再看“篆”这个字是“从竹彖声”。古代车的轂约上画的花纹叫“篆”，《周礼·春官宗伯》下：“孤卿夏篆”，《郑注》：“五采画轂约也。”又钟带上的花纹叫“篆”，《周礼·冬官考工记》下：“钟带谓之篆”。圭璋琮上的花纹叫“瑑”，《考工记》下：“瑑圭璋八寸”，又说：“瑑琮八寸”。《郑注》：“瑑，文饰也。”又在训诂上“椽”是圆形的椽，“缘”则有边缘、围绕、缠绳等义。这些都是从“彖”得声的字，可为篆的旁证。因知篆至少有两方面的基本含义：一是形状是圆的；二是用途是庄严郑重的。

再看秦代颂功刻石的篆字，不但笔划的轨迹没有硬方折的，其笔划线条也极匀净，比起商周铜器上的文字来，图画性减少，而便化的、图案的、线条的符号性增强。例如之为，之为。所以称为“引书”，正说明它已变成了匀净的线条组织了。所以秦文中不合这种庄严圆转风格的“约易”字体，便被加上“隶”的卑称。

四 籀文、大篆

“籀文”是什么样？在哪里有？为什么得名为“籀”？

籀文最可靠的样本，要属《说文》重文中注出是籀文的那二百二十五个字。此外石鼓文常被人指为是籀文，但论证并不充足。

至于为什么得名为籀？按汉代人说籀文是《史籀篇》中的字，而《史籀篇》是周宣王时太史名籀的人所作，因而得名，这一说相沿最久。至近代王国维先生在《观堂集林》卷五《史籀篇疏证》中又提出新说：因为《苍颉篇》首句是“苍颉作书”，所以推测《史籀篇》首句也必是“太史籀书”，这里“籀”字是“抽读”的意思，不是人名，又说《说文》里“存其字谓之籀文，举其书谓之《史篇》。”并说“籀文非书体之名”。又在《观堂集林》卷七《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一文中说籀文是西土文字，古文是东土文字。又在同书同卷《说文所谓古文说》一文中，也涉及这个问题，此外还有不少人对于《史籀篇》中的字是否周宣王时人所作，提出疑问，也有不少人对于王国维先生的说法提出争论，这里不再多举。总之，《史籀篇》这个书名，是由于太史籀，还是由于抽读，现在姑不论，而“籀文”的名称是从《史籀篇》书名而来，则是毫无疑义的。

现在值得探讨的，是以下几个问题：（1）“籀”是否字体名？（2）如果是一种字体，为什么仅仅《说文》里有二百多字？（3）它的形状有什么特点？（4）石鼓文（图 26）是否籀文？（5）《史籀篇》是否周宣王时所作？下面依次研究。

（1）《汉书·艺文志》说：“史籀十五篇”，注云：“周宣王时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时亡六篇矣。”又说：“《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与孔壁中古文异体。”《说文叙》说：“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

与古文或异。”从以上的材料中得知名为《史籀》的十五篇书，即是名为大篆的十五篇书。那么大篆这种字体名，即是《史籀篇》中的字样，应无疑义。《说文叙》中提到本书体例时说：“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可知《说文》重文中标明籀文的二百二十五个字，即是《史籀篇》中的字。大篆既明列为八体之一，那末说籀文是大篆这一体的诃称或别名，似乎亦无不可。问题只在于籀之为体，其特点是在于组织构造，或在于艺术风格，还是二者俱有罢了。

(2) 籀文既是一种字体，为什么《说文》里只出二百多字？按自段玉裁先生《说文叙注》以至王国维先生《史籀篇疏证》和《说文今叙篆文合以古籀说》考知《说文》体例是，凡古文、籀文与小篆相同的字出小篆；与小篆不同的字才出古、籀。可以说《说文》中小篆各字包括了可能包括的古、籀，而所出的只是与小篆组织构造不同的古、籀各字而已。段后王前还有许多学者提出过这样论证，今不具引。

再举一个字的例证来说明：文字的发生孳乳，必先有“一”、“二”、“三”，后有“弌”、“弌”、“弌”。而《说文》所出的古文中，只有“弌”、“弌”、“弌”。乾嘉诸学者考订那种“一”、“二”、“三”，是古、篆同有的字，所以只出小篆。也就是说，小篆的“一”、“二”、“三”已包括了古文。今按魏《正始石经》的古文中，固然有从“弌”的弌”、“弌”、“弌”。但《春秋》文公十一年残石中另有“一”字，古、篆、隶三体都作一横划的“一”（图64）。僖公部分残石中又有“二”、“三”各字，也都只是两三横划并不从“弌”的字。可见“古文经”中原是两种俱有，许慎用小篆统率古、籀，其体例愈发明显了。况且《说文》的著书目的是为解释经书，并不是要客观罗列各种各类的古字体来作成一部古代文字汇编性质的书。所以即使不是包括于小篆的字，也未必毫无放弃的。即如“奇字”一项，原是“新莽六书”之一，但《说文》中只出“仓、儿、无、晋、𠂔”五个字。难道当时的“奇字”仅只有这五个字吗？岂有仅仅五个字即被列为一体之理！这不难推测，“奇字”对于《说文》所要求的解经目的关系